

1962年

1962年综述

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统一认识，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西楼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家财政预算还隐藏着很大缺口，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等情况，认为全国的经济形势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对经济进行调整。3月，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提出，对重工业、基本建设指标的调整要准备做到“伤筋动骨”。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作出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要求坚决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5月2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定，再减少城镇人口2 000万，精减职工1 000万。与此同时，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收缩，实行关、停、并、转政策。至10月底，全国县以上工业企业减少1.9万个，基本建设投资压缩至46亿元。银行信贷和财政也实行紧缩，并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销售政策，以加速货币回笼。10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出现好转，中共中央于10月6日宣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

在经济调整的同时，党还采取措施对社会政治关系进行调整。3月，周恩来在广州戏剧创作会议和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划入“劳动者”之列。在随后召开

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提出了“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论断。4月，中央发出《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平反的通知》，对1958年以来历次运动中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4月下旬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作出进一步调整党同工商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宗教界、少数民族、归侨及其他爱国人士关系和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决定。此外，国家对侨务、民族等方面的政策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和改进。

8月上旬，为准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举行。毛泽东提出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随后，他在9月下旬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发挥了对上述3个问题的看法，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因此，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还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致使政治上的“左”倾错误严重发展。

10月，中印边界反击作战开始。战斗持续1个月。11月22日零时，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国政府的决定，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于12月1日开始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

年底，在保、匈、捷、意4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主持者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人民日报》先后发表《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文章，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和分裂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主要经济指标：工农业总产值1 280.2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下降10.1%。其中工业总产值850.2亿元，比上年下降16.6%；农业总产值430亿元，比上年增长6.2%，钢产量为667万吨，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6亿吨。其他工农业指标为：煤22 000亿吨，发电458亿度，棉花75万吨，油料200.3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71.26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4亿元，国家财政总收入313.6亿元，总支出305.3亿元，结余8.3亿元。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新年献词》。社论说，1961年我国人民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战胜了连续3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粮食方面得到了较1960年为好的收成。目前全国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的情况是好的，社员生活有了改善。少数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虽然还比较困难，但情况也比上一年好。工业方面，在提前两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产品生产指标的基础上，一年来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轻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产品的质量都有提高。社论指出：“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进一步贯彻执行总路线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办法，在国民经济中全面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完成国家计划，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进一步协调起来，使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社论提出：“在1962年中，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地争取农业生产尽可能多地超过1961年。这对于国计民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社论还强调，1962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一年，农、工、商、学、兵、政、党和群众工作等各个方面，都要鼓足干劲，实事求是，在当年内创造新的成就。社论充分肯定了大跃进中建立的社会物质基础，号召全国人民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前进。

同日 《红旗》杂志第十期发表社论：《鼓足干劲，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胜利》。社论说，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完全是正确的。为实现总路线所必需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办法，正在逐步发展和完备起来，并且已经在实际工作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社论着重强调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问题，指出：“加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一切工作部门，一切地方工作，一切事业单位中加强全局观点，这是为了推进我们当前的工作必须特别注意的一件事。”这是因为，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经济建设中所进行的调整工作带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一方面，需要总结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

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又要开辟前进的道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新的水平上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强调集中的领导，以保证党中央所规定的统一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国家的统一计划的贯彻执行，而反对实际工作中任何形式的分散主义的表现。”社论还阐述了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方针下中央与地方、中央与各部门、局部与全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加强集中统一同坚决执行群众路线的一致性等问题。

同日 中苏两党和两国领导人互致祝贺新年电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电文中说，中苏两大国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是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争取人类进步事业的根本保证。不断巩固和加强这种团结，在目前尤其具有重大意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在电文中说，在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在团结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的力量和增长他们的威力方面，过去的一年给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巨大的胜利。电文说，我们对我们伟大朋友和同盟者——中国人民在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1月2日 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4国工会代表团。受到接见的有：印度尼西亚中央工会国际部部长穆罕默德·多希尔为首的印尼工会代表团；古巴工人中央工会组织书记赫苏斯·索托·迪亚斯为首的古巴工会代表团；巴西瓜纳巴拉州木器工会领导人罗伯托·莫雷那为首的巴西工会代表团；司库吉·默·穆第索和以罗迪耳·里维拉·罗迪耳为首的洪都拉斯文化代表团等。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在座的有刘宁一、刘长胜等中国有关方面负责人。

1月3日 毛泽东接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同时受到接见的还有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及夫人以及安井郁的女儿安井侑子等，毛泽东同安井郁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刘宁一等也参加了接见。4日，首都各界人士1 500多人在政协礼堂集会。欢迎安井郁理事长。安井郁在会上作了题为《日本人民争取真正独立和平的斗争必将冲破反动的浪潮获得胜利》的长篇演讲。

同日 国务院作出规定，所有金银买卖调拨，一律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

1月4日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团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及附件：《共青团在学校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草案）》。1961年10月4日—26日，团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共青团在学校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会议的报告认为，近年来学校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针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在贯彻“兴无灭资”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某些政策界限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由于“红专”和所谓“白专”的概念含混，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读书，影响了部分同学的积极性。为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特制订《政治思想工作纲要》，在高中以上试行。《纲要》规定，共青团要在党的领导下，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团员，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同时，要教育学生用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努力读书，学好功课，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活动。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农村团的建设问题，认为近年来农村团的组织得到了发展和提高。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集体主义的光辉》。社论说，10年前，山西长治专区出现的10个以土地人股为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已是当地人民公社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农林牧副业都有很大增长。社论说，10个老社1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正是全国农民所走的道路。这条道路改变了几千年来使农民“陷于永远的穷苦”的状况，使他们摆脱了风雨飘摇的小农经济的困境。从10个老社集体经济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党所制定的有关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办好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党所规划的农民组织起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是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的。社论要求，要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使全体社员都自觉自

愿地把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为着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共同奋斗。

同日 中华书局举行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中华书局1912年1月1日创办于上海。50年中出版了大量教育、古籍和工具类书籍。

1月5日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聂荣臻、陆定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首都科技工作者。来自科学研究、设计、生产、教学、医药卫生和国防科学技术等各个岗位的4 000多名科技工作者出席了宴会。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致词，号召科技工作者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为了世界和平，树立雄心壮志，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在1962年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陈毅副总理在长篇讲话中说，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希望。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工作者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勉励科技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在工作中和治学中要闻胜不骄、闻败不馁、专心致志、踏踏实实、不浮夸、不图侥幸、准备付出毕生的精力攀登科技高峰。与会者对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同日 国家体委公布1961年体育运动成果。公报说，1961年共创全国纪录102项，占已公布的全国纪录的1/3以上，其中包括由陈镜开、王锡华等人创造的9项世界纪录（射箭、举重各1项，跳伞2项，航空模型5项）。公报说，1961年在游泳、射箭、举重等项目上打破全国纪录最多。其中游泳刷新纪录20项，占全部项目的2/3以上；射箭20项，全国纪录被刷新14项；举重28个项目中被刷新16项。在田径方面，福建选手倪志钦跳过了2.11米的高度，列世界第四位。公报说，在这次公布的300项全国纪录中，属于1961年前创造的共198项，其中1960年122项，1959年61项，1958年10项，1957年3项，1956年和1954年各1项。

1月10日 财政部、国家计委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四项费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通知》规定，自1962年起，除商业部门外，其他各

部门的企业，不再实行利润留成办法。国家对企业所需的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劳动安全保护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实行拨款。

1月11日 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议历时28天（其中包括春节休息两天）。会议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月11日到29日上午，主要是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稿进行讨论和修改。在分组讨论中，各地代表还对几年来的工作做了联系实际检查。与此同时，由刘少奇主持，组织了由彭真等21人参加的起草委员会，对“书面报告”进行了8天的讨论和修改，形成“书面报告”第二稿，于1月26日印发到会同志提意见。“书面报告”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在列举了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之后，报告着重指出工作中发生的如下缺点和错误：一、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二、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四、对农业增长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书面报告”还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即：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二、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能混淆；四、全民所有制在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七、国家计划的

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八、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十、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十一、必须爱惜群众的精力；十二、必须吸取外国的经验；十三、必须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十四、必须实行“精兵简政”；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十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进一步的说明。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下述重要看法：一、对于“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二、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三、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作即席讲话，提出发扬民主、上下通气问题，他号召把会议开成“出气会”，并建议延长会期。从此会议进入第二阶段。30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讲话共分六点，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当场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泽东还在讲话中着重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毛泽东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的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当日晚，毛泽东又召集各大组负责人开会，继续强调发扬民主，上下通气，并对开好“出气会”作了安排。1月31日—2月6日上午，会议各大组对省委、中央局、国家机关，以及

有关负责同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各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和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些领导人在分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职责。2月6日下午，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就党的工作问题讲了话，并从中央书记处工作角度，对几年来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2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对个人错误作了深刻检查，对国务院工作中的缺点承担了责任。同时，他还在讲话中提出了克服当时困难的8条主要办法。在此之前，朱德、陈云、刘少奇也都在各自所在大组上讲了话。这些讲话涉及到了党内斗争的扩大化问题和党内生活不正常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等问题，林彪于1月29日在大会上发言，他突出地提出：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用“左”或右的思想干扰了毛主席等等。2月7日下午周恩来讲话后大会闭幕。

1月13日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日本社会党第三次访华团团团长铃木茂三郎发表共同声明。声明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进一步压倒西风。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大大发展，超过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力量。美帝国主义是世界紧张局势的根源。双方就日本实现中立、缔结中日友好不侵犯条约、禁止核武器、缔结日苏和约、反对“日韩会谈”、美国干涉老挝和越南南部、以及反对日本池田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等问题，发表了一致看法。双方表示，根据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要不断地为发展两国民间友好贸易，为促进实现政府间的贸易协定而努力。

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贷款协定》等五项协定和议定书。五项协定和议定书分别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贷款的协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向阿尔巴尼亚供应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的议定书的补充换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政府关于1962年交换货物和付款的议定书》，《关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1962年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贷款的议定书》及《中阿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六届会议议定书》等。

同日 东方歌舞团举行建团典礼。东方歌舞团是适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发展而建立的，它以学习和表演亚、非、拉国家人民的歌舞为主要任务，演员队伍以中央歌舞团东方舞蹈班为基础，抽调各地区和部队优秀舞蹈表演人才组成。陈毅副总理出席了建团典礼，他在讲话中要求，歌舞团要认真学习亚、非、拉各国人民的舞蹈，要学得好、学得像。要学习各国人民艺术的长处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为世界人民的友谊服务。东方歌舞团第一任团长为戴碧湘。

同日 中国、老挝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航运协定规定，双方指定的空运企业将在双方同意的航线上作定期和不定期的航班飞行。公路协定规定，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同意修建自中国云南省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中国政府将负责上述公路的全部修建工程，并同意承担上述公路在老挝境内一段的全部工程修建费用，作为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

1月14日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贸易部长恩杰拉、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希提。15日中阿双方发表经济会谈新闻公报，宣布双方签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贷款的协定》、《关于1962年交换货物和付款的议定书》等六项协定。

1月15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谴责美国政府反共暴行，支持美共正义斗争的声明。声明就美国司法机关利用“麦卡伦法”和“史密斯法”于2月1日开始对美国共产党进行审讯一事指出：“以肯尼迪为代表的美国反动派这样卑鄙地迫害美国共产党，是对美国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的猖狂进攻，是在国内加紧实行法西斯化的一个严重步骤，也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新的反共、反人民行动，推行新的战争计划的一个严重步骤。”声明剖析了美国统治者试图通过加紧迫害进步力量来推行其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用心，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提高警惕。声明还揭露了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实

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和一切进步力量进行专政的事实。声明说，中共中央代表全体党员和全中国人民，坚决谴责美国政府这一反共、反人民的暴行，坚决支持美国共产党反抗美国政府残暴迫害的斗争。

1月18日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关于西藏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1951年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后的各项发展，着重说明了反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实行民主改革以及近年在西藏工作的体会等等。报告说，到1960年年底，在87万人口的农业区，5万人口的城市，已基本完成了民主改革，并开展了改革复查。在28万人口的牧业区，已有三分之二以上人口的地区进行了“三反两利”运动。报告说，在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之后，从1960年底开始，西藏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已有90%以上的农户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参加了互助组，并于当年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在工业交通方面，已建有水电、汽车修配、农具制造、血清兽药等小型工厂。随着川藏、青藏、新藏公路的建成，西藏地区70%以上的县已通汽车，正形成以拉萨为中心的公路网。报告总结的四项工作体会是：一、千条万条党的领导第一条；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决贯彻群众路线；三、我国6.5亿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是我国各族人民幸福的源泉，是各族人民建设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满幸福社会的最重要保证；四、培养干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

1月20日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出《进一步加强教育经费管理的补充意见》。《意见》规定：一、各地要妥善安排教育经费预算指标。二、教育经费预算指标应根据勤俭办校的方针和逐步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按重点使用和照顾一般的原则来安排。三、预算指标允许项目之间相互调剂。四、省、市、自治区应在农业税地方附加税中划出一定的款项，作为农村公办和民办教育事业补助之用。五、学校生产劳动收入（包括农副业生产）除缴纳工商统一税外，不上缴利润，不交纳所得税。六、教育行政部门应有一位领导同志负责

主管财务工作，并健全财务管理机构。

1月27日 上海市各界集会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30周年。前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先后在会上讲话，他们追述了淞沪抗战的经过，赞扬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组织下，上海工人、学生、妇女深入前线，出生入死，形成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运动的伟大作用。他们在讲话中都严厉谴责了美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1月30日 公安部发布停止受理选择中国国籍的公告。公告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和实施办法的规定，同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和印度尼西亚国籍的已成年人，应在1960年1月20日条约生效后的两年内选择他们的国籍。现期限已满，从1962年1月20日起，各县（市）公安局停止受理选择中国国籍的申请。

2月1日 李敖在台湾《文星》杂志52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章，引发针对“全盘西化论”的论战。文章猛烈地抨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面，以30年来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事实为依据，集中批判了中国文化的保守性、狭隘性，指出中国人具有群体性集体意识。随后，《政治评论》、《民主评论》、《世界评论》、《文星》杂志针对“全盘西化论”展开了激烈论战。李敖，1935年生于哈尔滨。1949年到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曾任《文星》杂志主编。1965年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公开批评台湾当局，《文星》因此被查封。1971年，以“叛乱”罪被判刑10年。1976年被释放。1981年，又因批评台湾当局，再度被捕入狱半年。著有《传统下的独白》、《胡适评传》、《上下古今谈》、《天下没有白坐的牢》、《李敖文存》等。

2月4日 首都各界集会抗议美帝国主义迫害刚果民族主义领袖基赞加。大会谴责了美国利用“联合国军”逮捕基赞加的罪恶行径。陈毅副总理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他指出，美帝国主义尽管使尽一切阴谋手段，屠杀刚果爱国领袖，分裂刚果爱国力量，但是他们企图把刚果变为美国殖民地的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其结果只能教育刚

果人民，走上坚强地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道路。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和刚果农工工农联合会总书记阿里阿斯也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

2月5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联欢晚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林彪、邓小平以及黄炎培、彭真、李维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京举行的联欢晚会，同首都4万多军民共度春节。4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林彪还参加了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委举行的联欢晚会。

2月8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1962年基本建设初步安排的紧急规定》。《规定》要求，目前暂按1961年12月20日安排意见，即投资59.5亿元，大中型项目718个来部署工作。凡不属这个范围的工程，都应一律立即停止施工；个别计划外的项目，地方和部门认为必须继续施工的，必须报中央审查批准。

2月9日 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去世。李克农，安徽巢县人。1898年生。五四运动时期参加进步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至1931年在上海党中央工作。1931年到达江西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等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委员兼秘书长等职务。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第二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2月12日—27日 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举行第三届代表会议。来自全国各地区、包括12个民族、分属于佛教各教派的24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听取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关于国内外形势问题的报告，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萧贤法关于宗教政策的报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朴初代表第二届理事会所作

的工作报告。会议认为，4年来全国各民族人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祖国建设事业取得了多方面巨大成就。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全国佛教徒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据6项政治标准，积极进行自我改造。佛教协会应继续加强和各国佛教徒的联系，为促进友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做出贡献。会议选举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的理事、会长和副会长，一致推举班禅额尔德尼和应慈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喜饶嘉措被选为会长、阿旺嘉措、噶丹赤巴、土登贡噶、赵朴初、能海、松留、阿嘎牟尼（景洪）、噶喇藏、巨赞、周叔迦、悟古腊、嘉木样当选为副会长。在27日的闭幕式上，会议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并于下午在雍和宫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庆祝会议成功。

同日 首都各界集会支持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大会由中拉友协、全国总工会、全国青联、全国妇联、全国学联发起。陈毅副总理到会并讲话。他说，古巴第2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是声讨帝国主义的檄文，是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团结战斗的旗帜，是保卫古巴革命、维护拉丁美洲各国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斗争纲领”。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古巴驻华大使皮诺·桑托斯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大会还发表了支持古巴第二个哈瓦那宣言的通电。15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古巴人民致美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全文。

2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示》共分六个部分。一、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试点表明，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下述好处：第一，能够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既有生产管理权，又有分配决定权，直接组织生产的单位和基本核算的单位统一起来，生产和分配也就统一起来。第二，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有了很好的保障，生产队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大为增加，改变了过去那种进行生产同安排和指挥生产不统一的状况。第三，适合于当前农民的觉悟程度，使社员对于集体经济同自己的利害关系，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看得最直接，看得最清楚。第四，有利

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生产队规模不大又自负盈亏，它办得好和不好，同每个社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且便于社员直接参与管理和对干部实行监督。二、现阶段人民公社的体制，大体存在两种形式：一种形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另一种形式，仍然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凡是符合群众要求，同群众经验相适应的形式和做法，都应当允许。我们在农村工作中取得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就是对于农民，对于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集体经济中的一切设施，一切制度，都必须建立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只有自愿，才能巩固和持久。只有互利，才能有真正的自愿。在确定以生产队还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必须严格地遵守这个原则。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实行的根本制度，基本核算单位一经确定之后，就要稳定下来，不能任意变动。三、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生产队后，人民公社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集体经济组织，公社内部仍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生产队仍然是生产大队这一级经济组织的组成部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生产大队仍然在全大队范围内实行统一领导。农村党的支部，一般的仍然应当以生产大队单位建立。在经济方面，生产大队的任务是：（一）帮助生产队做好生产计划，保证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任务的完成；（二）保证完成国家的征购、派购和收购任务；（三）对生产队的生产、分配和财务工作，进行正确的指导、检查和督促；（四）领导兴办和管理全大队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五）经营大队企业，管好大队所有的大型农业机具和运输工具；（六）举办全大队的集体福利事业，和生产队共同负责安排好五保户和困难户的生活；（七）领导全大队的民政、民兵治安、文教卫生等工作；（八）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四、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生产队既要正确地规划生产，又要统一核算收支；既要做好生产组织工作，又要做好财务管理的工作；既要积极完成国家的农产品征购任务，又要切实安

排好社员生活。各级地方党委，特别是县委，都应当把加强生产队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五、要妥善解决下述八个在调整基本核算单位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一）规模。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都要适当。（二）干部。必须力求精减。（三）土地。原来“四固定”的土地，可基本不动，个别调整。（四）耕畜、农具。只要基本上合理的，一般不再变动。（五）大队企业。不利分散经营的，仍归大队经营；凡生产队经营更有利的，下放给生产队。（六）林木。大片集中林木，可仍归大队所有；分散的小片林木，应下放给生产队所有。（七）水利，应以便于管理、保护、维修和充分利用为原则。（八）债务。过去一切债务，都要结算清楚，不能任意宣布废除。六、调整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力争在春耕开始前后完成。

同日 首都各界集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2周年。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出席了大会。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分别讲话。林枫在讲话中强调，中苏同盟的存在，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遭遇到最大的障碍。他希望看到伟大的中苏同盟日益巩固。契尔沃年科大使在讲话中说，帝国主义独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苏联政府现在和将来始终不渝地执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人民日报》14日发表社论：《伟大的友好的节日》。

2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62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700万人的决定》。《决定》说，自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以来，全国减少了城镇人口1 300万人，精简职工950万人，这为促进企、事业的调整，加强农业战线，改善国家当前的经济状况带来了许多益处。但是，由于城镇人口和职工过多而给经济上造成的困难，还没有完全解决，因此，还需要减少一大批城镇人口和职工。为此，中央决定：一、1962年上半年全国再减少城镇人口700万人，其中职工应占500万人以上，争取在春耕或者夏收前完成。二、各企业单位，应当根据今明两年的生产任务，结合“五定”工作实事求是地作出职工